上訴案第 829/2009 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判決書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 CR3-07-0113-PCC 號案中，上訴人 A 觸犯加重盜竊罪被判處三年實際徒刑，以及對受害公司 129520 澳門元的賠償。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並且已於 2009 年 9 月 5 日服滿了 2/3 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 PLC-040-09-2-A 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 2009 年 9 月 7 日作出批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上訴人之假釋申請已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假釋制度形式要件；
2. 被上數之批示否決上訴人之假釋聲請主要內容為上訴人仍未向被害人作出任何的賠償及上訴人被判刑之罪行屬嚴重。
3. 上訴人未對被害人作出賠償或未曾繳交司法費並不能直接反映上訴人的人格及對所觸犯的行為是否存有悔意。

4. 不應單單以上訴人未支付損害賠償而視上訴人並無悔意，從而否決假釋申請。
5. 《刑法典》第 56 條至第 59 條並沒有排除罪行嚴重者之聲請假釋權利以及獲假釋之權利。
6. 此外，“犯罪的性質嚴重”這一點，在上訴人被判刑時已明確及公正地反映在上訴人的刑期中。
7. 上訴人從入獄至今並無違反獄規的記錄，上訴人更獲獄方評定為“信任類”及屬“良”之級別，上訴人犯案時為初犯。
8. 從卷宗內可見，上訴人已存在社工、獄方、家庭、及工作證明、並給予肯定及正面評價；反之，未有任何證據以顯示上訴人倘獲假釋將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9. 因此，綜合上訴兩點內容，被上訴之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 56 條至第 59 條關於假釋制度的立法精神。故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之“理解法律錯誤而出現之瑕疵”。
10. 根據卷宗內之證據，尤其是獄方及社工報告而言，再分析《刑法典》第 56 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及立法精神下，我們認為，應宣告廢止被上訴之批示，並判處上訴人即時可獲得假釋。

請求

基於上訴的事實及法律規定下，在此請求法院宣告如下：

- a. 接納本上訴；及
- b. 宣告因著被上訴的批示違反《刑法典》第 56 條及續後條文規定之假釋法律制度之規定及立法精神，存在《刑事訴訟法典》400 條第 1 款規定之“錯誤理解法律而出現之瑕疵”，

故被廢止；及

- c. 判處給予上訴人獲得假釋的優惠。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反駁，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以下法律意見：

“上訴人 A 不服初級法院法官作出的否決其假釋申請的決定，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認為其符合批准假釋的條件，應獲得假釋。

我們同意檢察院司法官在其對上訴理由闡述的答覆中所提出的觀點，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能成立。

根據《刑法典》第 56 條的規定，“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刑者假釋；

-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由此可見，是否給予假釋取決於上述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是否同時成立。

眾所周知，假釋的給予並不具自動性，也就是說，當被判刑者具備了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時，並不一定能獲得假釋，還要看他是否也同時具備了實質要件。

假釋的形式要件指的是被判刑者服刑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服刑六個月；實質要件則指的是在綜合分析了被判刑者的整體情況並考慮到犯罪的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後，法院在被判刑者回歸社會和假釋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影響兩方面均形成了有利於被判刑者的判斷。

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寧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參閱迪亞士教授所著《葡萄牙刑法 -- 犯罪的法律後果》）一書，第 538 至 541 頁）

因此，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

分析卷宗中所載的資料，毫無疑問的是上訴人確實具備了獲得假釋的形式要件，但在實質要件方面我們則不能得出同樣的結論。也就是說，我們對上訴人一旦被提前釋放後能否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及對被判刑者的假釋並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仍持懷疑態度。

在被上訴的批示中，法官正是從假釋的實質要件方面來分析是否應給予上訴人假釋，在綜合考慮了上訴人各方面的情況後，得出了不利於上訴人的結論，從而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姑且不論上訴人是否已具備《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a)項所規定的條件，如前所述，我們必須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的影響並可能對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造成的損害加以衡量和考慮。

案卷資料顯示，上訴人在自願、故意及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協議和合力，破壞由澳門機場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貨倉之外圍鐵絲網，不正當侵入該貨倉，用剪鉗及美工刀將該貨倉內的電纜剪下，並割開包

裹電纜的膠皮，取去電纜內的銅芯據為己有，給被害人造成巨額損失，因此被以加重盜竊罪判處三年實際徒刑。

上訴人並非本澳居民，雖然作案前在內地有正當職業及合理收入，但來澳後不惜以身犯法實施盜竊行為。案中其他同案犯身份及下落不明，上訴人亦未向被害人支付法院訂定的賠償金額。雖然上訴人不應因為其經濟條件未能履行賠償義務而被剝奪假釋的權利，但並不妨礙法院在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時加以考慮，因為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同樣不應被忽視。

上訴人所犯罪行具有一定的嚴重性，對他人財產安全造成損害，在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方面造成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

考慮到對上訴人所犯罪行進行一般預防的要求，考慮到提前釋放上訴人對維護法律秩序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考慮到需要維持公眾對上訴人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不能認為提前釋放上訴人不會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造成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現階段上訴人仍未具備《刑法典》第 56 條 b)項所規定的給予假釋的前提條件，因此應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本院接受 A 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第 CR3-07-0113-PCC 號案中，上訴人 A 觸犯加重盜竊罪被判處三年實際徒刑，以及對受害公司 129520 澳門元的賠償。
- 上訴人將於 2010 年 9 月 5 日服完全部徒刑。並於 2009 年 9 月 5 日服完刑期的三分二。
- 監獄方面於 2008 年 7 月 31 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同意接受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 56 條的規定。

讓我們分析這些上訴理由。

我們知道，刑法上所確立的假釋制度是一種附條件的提前釋放並以引導犯人逐步回歸社會正常生活的途徑及措施的刑罰執行制度，它體現了實現刑罰的目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是在預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起到積極作用。今天的假釋制度亦從單純考慮特別預防發展到具有綜合特別及一般預防的要求的相對完整的制度。

《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

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 **Figueiredo Dias** 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¹

那麼，我們看看。

從其獄中的表現來看，雖然，上訴人在服刑期間沒有觸犯監獄制度的行為出現，在獄中的行為也被評定為“良”，但是，我們看到的是除了“自其入獄後感到非常後悔，並承諾重新做人以及為自己的家庭負責人”（這些主觀意識的因素）之外，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具體的事實（這

¹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些客觀事實的因素)可以得出上訴人的人格已朝正面及積極的方向發展的結論。

應該說，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沒有實際的行為表現讓人相信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得出這種結論也不是像上訴人所說的單純從某一方面的因素考慮，而是從所有的事實綜合考慮，包括上訴人對自己的犯罪以及給這個社會帶來的傷害沒有的認識，根本沒有表示過交納訴訟費用以及對受害公司作出賠償的意願等因素。在短短的兩年的服刑期間，我們還看不到上訴人在重塑人格上有實質的進展。那麼，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已經不能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既使不考慮這些，單從我們必須同意的在預防犯罪以及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考慮方面的論述來考慮，被上訴決定亦應予以維持。

原審法官在其決定中提到，假若提早釋放，將不利於維護法律秩序和影響社會安寧。

不容否認，澳門是一個以旅遊業為龍頭的社區，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對以旅遊身份來澳犯罪的人歷來有作出嚴厲懲罰的要求，因為這類人的犯罪構成了對這個社區的人身、財產的安全，對社會的法律秩序和安寧的一種嚴重的威脅。

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這就決定了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批示。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而否決假釋的決定應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一致決定判處 A 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 3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以及委任辯護人的 800 澳門元的代理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09 年 11 月 19 日

蔡武彬

José M.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陳廣勝